

第一章 社会理论的困境

社会理论的‘历史包袱’^①

伟大的人物让后继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每当政治、艺术或思想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时，随之而来并从中受益的一代人，可能会有一种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值得再去做的无所作为的感觉。他们可能觉得最宝贵的机会已经为前人所把握并转化成了成功的契机。因此，后来者总像是处于困境之中：或者仅仅是伟人们留下的遗产的看管人；或者虽希望独立，但由于对成功缺乏信心，只能将抱负大大压缩，并开始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

在理论思想史中，这种困境呈现出一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即使因为失去独立性而充满内疚，后来者仍成为古典文献的注释者。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谎称以前的时代属于可以不受学科划分的限制进行探索的科学发展的前历史蒙昧时代，并以指责其前辈永远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为代价，把专门性的研究作

^① See W. Jackson Bate, *The Burden of the Past and the English Poet* (New York, Norton, 1972), pp. 3—11.

为一种摆脱困境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保护他们，使之避免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

这两种对待伟大时代以后问题的态度，都是智力与心力的失败。它们意味着不愿直面伟大的事物，也不敢勇敢和诚实地模仿他们所钦佩的前辈。这种怯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致使学者们陷入一种以对一般理论持防御性的怀疑态度为面具的内在自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证实其个性的惟一方法是对名家著作的细枝末节进行争辩——寻找出现在黄道带上的天蟹座光彩，因为它咬住了海格立斯的脚踵^②。

在某些环境下可以或难或易地避免这些倾向。一旦伟大的时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比较容易自立。人们在其影响下生活的思想家可能被界定为经典作家。这种把与人们最直接相关的名作界定为经典著作的行为，可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解放效应，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已经能够承认并仿效过去时代的理论家，而同时又保持一种对于自己环境的独特意识以及那些有待完成的任务的尊严。这样，他就不再害怕承认那些经典著作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自由地进入一种与大师比肩的合作关系。

前文有关伟大人物与其后代关系的所有陈述，也适用于我们对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前几十年创立了后来以社会理论著称的那些人的态度，尤其是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从他们时代以来的大部分社会思想或者是对他们的学说进行评论，或者是在他们创立的传统内进行专门化的工作。这些专门化的领域离创立者的原始抱负越远，它们越假装具有科学独立性，它们

^② See Joao Mangabeira, Rui. *O Estadista da Republica* (Rio de Janeiro, Olympio, 1943), p. 15.

就变得越没有启发作用。

当然，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似乎应该能够开始将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视为经典作家，并将他们所创立的学说视为经典社会理论，以区别于在它之前的长期的政治哲学传统。

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

社会理论是对社会的研究，其典型特征始见于孟德斯鸠及其同时代人和后继者的著述，并在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的著作中达到了某种顶点。它以区别于古人和经院哲学家的政治思想而首次确立其存在，主要有两个特征将其区别于早期传统：一个与其自身的目的和方法的观念有关；另一个与对人性 and 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有关。尽管这两个方面早已为人知晓，但它们对社会思想的中心问题所具有的含意却仍受到误解。

古人的政治哲学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这意味着它远不止关心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也不止想将其有关个人和社会的观点付诸实践，因为这两者都可以说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理论。它表明，传统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完全）不知区分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评价有何意义的方法。

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个人在社会中实际上是如何的，那么他也会认识到他们应该是如何的人。在这种理论的中心是一种对于目的与存在关系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对于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法定的特定认识。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实现其内在的目的或善，这会较完美地实现其本质。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完成了上帝的安排。人的意识包括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不能本能地知晓

自己的目的 他必须通过思维发现它 因此 他有能力偏离目的。

实现目的的努力使所有的现象都具有某种被理解为遵守规律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是由上帝所确立的决定善恶的标准，它们向我们表明事物像什么以及它们应该成为什么。在这种思想传统中，(a) 有关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相互关系的描述性规律或解释性规律和 (b) 用来确定个人应该怎样行为的道德规范或政治规范，很少区分或不加区分。

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科学与道德评价的对立 以及描述性法则与规范性法则的对立，是社会理论传统和自然科学成长中的主要论题。自孟德斯鸠以来，传统的创立者的著述中常见的许多模糊之处，或者是因为这些思想家还没有割断将他们与更为古老的观念绑在一起的联系，或者是因为他们用古人的惯常术语来表达用古代政治哲学语言无法充分阐述的想法^③。

这就把我带到了古代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第二个主要对立点：对人性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经典社会理论家所反对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存在着一种所有人共享的（不管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如何）普遍的人性。对古人来说，最好的政体是那种能够最好地开发人性善的方面、最有效地抑制人性恶的方面的政体。

这种态度的一个结果是倾向于将历史当作某种生活背景，虽然历史改变了生存环境，但并没有更改其基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牢牢地根植于不变的人性之中。单一的、超历史的人性理论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漠视对某类社会生活具有特殊意义并多少已为参与该社会生活的所有人所广泛接受的一系列价值和认

^③ See Louis Althusser, *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59), pp.20—21.

识^④。一方面是人类精神的普遍特点，另一方面则是单个人的信仰和目的。在人类知识的普遍属性和特定个人的精神之间，没有诸如社会意识或文化之类的东西。

与我刚刚描述的观点相反，社会理论致力于探寻并理解在每一种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他人、本性和自我的认识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与其说它关注个人的心理或者普遍人性的一般构成，不如说它关注那些构成一个社会特定文化的、历史上独特的共同认识 and 理想体系。的确，它往往愿意牺牲那个非常有名的共同人性的观念以便满足自己的历史意识^⑤。

人性的历史观念与强调认识和评价的区别紧密地联系着。在现代人的看来，古人是在把人看作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实际是什么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虚幻无用的学说。古人因为未能考虑人性恶的程度而被指责为肤浅，而现代人很快就成为研究人性恶方面的专家。

社会理论的统一和危机

在当前关于社会科学的思考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两种互补的声音。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当前在社会科学的专门领域内进行的关于社会的研究依赖于一种由概念、方法、理论和心照不宣的假设所组成的遗产，而它则是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

^④ See Emile Durkheim, *Montesquieu et Rousseau. Précurseurs de la Sociologie* (Paris, Riviere, 1953), p. 47.

^⑤ See Robert Cumming, *Human Nature and History.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 Chicago, 1969), vol. I, pp. 66—75.

期主要的社会理论家们传给我们的。这也就是他们的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著作的原因所在；我们这些后来人与经典著作的关系是一种既依赖又背离的关系。在这种观点中通常隐含一个明显程度不同的命题，即经典遗产中的不同立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像托克维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这样一些类似的思想家也会彼此有别，但是，据说他们的独特方法以若干种远非微不足道的方式迭盖在一起^⑥。

我们继续被约束在经典社会理论安置在认识社会之上的框架之内的观念，日益增加地伴随着对社会思想现状的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典作家及其他们的后继者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出了毛病。有时，这一结论建立在这样一个概念基础上，即经典社会理论的方法上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不适当之处。有时反对意见则直指主题：即经典社会理论家所分析过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它们的认识不再有用。在更为微妙和影响更为深远的批评意见中，上述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⑦。

因此，据说我们当今对社会的认识处在一个“危机”之中，并且，这种危机与社会本身的一个深刻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经典理论的产生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紧

⑥ 关于这一主题的两点观点，参见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以及 Robert A.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对社会理论传统的一般观察 参见 Carlo Antoni, *Dallo Storicismo alla Sociologia* (Florence, Sansoni, 1940);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1971) ;以及 Gianfranco Poggi, *Images of Society: Essays on th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cqueville, Marx, and Durkheim* (Stanford, Stanford, 1972)。

⑦ See Alvin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密相联一样。只有根据新出现的社会条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重铸社会理论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工具，我们才能走出这种困境。在设计将会解释我们自己历史条件的独特特征的的努力中，我们可能会加深什么是关于人和社会的普遍真理的认识。

若不更加详细地分析它们，人们既不能对前述主张作出评价，也不能依此而决定如何行事，首先要考虑经典社会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在经典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人们很难发现哪怕是单一理论的一个轮廓。确实，一旦超出将社会理论区别于政治哲学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基本特征之外，人们会发现在现代人之间几乎对每一决定性要点都存在分歧。然而，尽管答案殊异，但在提出的问题上却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如果经典社会理论有什么统一性的话，那也是一种基于共同困境而产生的统一性，而不是一种共同理论的统一性，是一份虽然已经提出但还只是部分解决的谜团的议事日程表。

有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方法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在思想和语言中描绘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社会秩序问题：什么将社会维系在一起？如果方法理论是怎样安排我们对社会的观念的见解，一种社会秩序理论则对社会本身的安排提出一种解释，它主要关心的是人们据以组织其相互交往的规则。第三是现代性问题：当现代社会出现于欧洲的时候，什么特点使它与其他社会形态相互区别，以及这一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与它的现实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它的表象与它的真实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相互联系着，尽管是以非常模糊和复杂的方式彼此联系着。

与古代政治哲学决裂只能以逐渐明晰的方式决定性地构成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无论他们是正在对付解释、社会秩序还

是现代性，经典社会理论家们发现他们正在面对着他们曾经试图通过更具综合性的理论摆脱的困境。正是他们也陷入了同样谜宫的事实，使得这些欧洲的社会思想家们也成为西方知识历史上一一种似曾相识的运动的解释人。

关于经典社会理论统一性的这种假设，对该理论的危机提出了一种暂时的看法。解释、秩序和现代性的中心问题在重要的方面仍未解决，而且，未能处理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困难又与现代社会的变革混合在一起。

但是，事实将会证明，这些尚未回答的问题根本不能由社会理论的创始人所塑造的那些理论加以解释。一个解决解释、秩序和现代性的方案应要求一种对社会理论断言自己独立于希腊——基督教哲学的根本前提的重新定义：区别认识与道德评价及否认一种超历史的人性。要实现自己的纲领，社会理论必须打碎自己。现在，让我们通过逐个地审查社会学传统中的焦点争论而把上述论点贯彻到底。

方 法 问 题

社会理论家探讨方法问题所用的方式以及我们继续应付这一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适用于现代西方思想的、非常有限的基本解释系统的储备所决定的。事实上，人们可以说，所有这些解释都是两种纯粹类型的变种：逻辑分析和因果解释。它们之中的每一种既在说明它像什么的意义上，即描述，又在表明它为什么必须紧随别的事的意义上，即严格意义上的解释，提供一种关于解释某物意味着什么的诠释。（无论何时，当我不加

对比限制地使用‘解释’时 我是指它既包括描述 也包括严格意义上的解释。)

逻辑分析和因果关系获得当前的含义都不是突然的事。相反，它们都经历一段长期和曲折的历史：它们出现于特定的时期并且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它们所呈现的选择似乎告诉我们有关精神及其发展的某些深层的东西。我将从它们的最简单的抽象形式开始，陈述逻辑分析和因果关系纲要，然后，继续说明社会理论怎样利用它们，以及它在这样做时遇到了什么障碍。

逻辑必然性和因果解释都以必然性、顺序和客观性等属性来描述相互关系。在每种情况下，都是如果 a 那么 b 的陈述。在两种关系中 给定 a , b 必然出现 至少 b 更有可能出现。(或然性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稀释了的必然性。)并且，在每种关系中 a , 总是以某种方式先于 b , 甚至在逻辑必然性中“如果 a 那么 b ”能够转换成“如果 b 那么 a ”也并不总是真实的。最后， b 是否逻辑上或因果关系上跟着 a ，是关于世界的一个客观事实，或者是通过援引普遍的标准能够加以确定的一个事实，而这些标准如此普遍以致可以引导所有的人承认它们。

逻辑关系不同于因果关系 后者给顺序加上了持续期间 而前者仅只表示顺序。顺序和持续期间的结合被叫做时间。一种因果关系解释总是一种对时间中事件之间关系的解释，一种逻辑分析则涉及时间以外的概念之间的联系

两种解释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则不得不涉及它们术语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逻辑关系总是形式的：它代表它聚拢在一起的、作为与内容无关的抽象形式的普遍物。它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区别。与它相对照，因果解释总是作为解释特殊事件间关系的一种尝试而开始的。即使它趋向于更高层次的概

括，它的最终的合理性继续是它解释经验中特定事件之间暂时顺序的能力。

逻辑分析和因果关系解释之间的两个区别互为对立面。在因果关系思想所论述的时间世界里，客体和事件具有实体内容，这意味着它们作为单个的实体互不相同，尽管必须依靠理论来确定什么可以算作单个的实体。在逻辑分析所论述的永恒领域中，只能遇到没有个体差别的普遍种类、纲目或概念。有普遍性 但没有特殊性。

逻辑分析的真正奥秘在于 以它的纯粹形式 它怎能以及以什么方式适用于现实世界。因果关系的矛盾则与具体因果关系判断的可能性有关。因果关系解释要求将特定的结果归于特定的原因，然而，说明越全面并且因此越精确，所有过去的事就越似乎对现在发生的任何事负责。因果关系链在空间和时间的每一个方向不间断地延伸，这样，在因果认识当中具体化的需要和全面性需要之间就有冲突^⑧。

逻辑方法和因果关系方法是社会研究中处理解释问题的两种方式的起点。在某些方面，经典社会理论就是克服这两种思想模式局限性的一种尝试，它的致命弱点之一在于它未能完成这一任务。

第一类社会思想依靠的是逻辑方法，我将称之为理性主义，也许新古典经济学最接近于例证它。理性主义战略从选择几个关于人性的一般前提出发，这种选择不是为了描述精确，而是为了有力地说明他们使之成为可能的结论。通过连续的逻辑演绎和概念的精确化过程，以及在许多方面沿着有关自然和社会的

^⑧ See Bertrand Russell,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London, Allen, 1971), pp. 98—99.

某些经验假定的路子的介绍，它从这些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一串日益发展的结论。理性主义社会科学渴望成为一种陈述的体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由精确性、坚固性和矛盾等准确的逻辑观念支配。

整个的思想体系，除了错综复杂却不得不加以引进的经验假设以外，放弃了假装描述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了什么的姿态。它在假设的层面上运动：其结论的描述真实性仅限于其前提成立的范围。通过加强或放松前提的严密性，通过使前提或多或少复杂些并因此使它们或多或少更忠实于我们想认识的社会现实，我们就可以控制解释的简明和描述的逼真之间的平衡^⑨。

我们越倾向于前者，我们的推论不能适用于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任何世界的危险就越大；我们越倾向于后者，我们的猜想退化为一系列受到限制和复杂的命题，以致我们只剩下大量的常识印象的危险就越高。是否强调简明或忠于事实，将取决于我们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的特定目的。

在对待解释问题上，与理性主义完全对立的思想传统常常以历史主义命名。正如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一样，与浪漫主义运动相联的那种编史工作是历史主义的一个例证。它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而不是逻辑精确联系作为它主导的思想结构，它的纲领是去发现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它既是描述的过程也是解释的过程^⑩。

^⑨ See Lione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48), especially pp. 104—135, 151—158.

^⑩ See Friedrich 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ed. Carl Hinrichs, *Werke*, ed. Hans Herzfeld et al. (Munich, Oldenbourg, 1959); Pietro Rossi, *Lo Storicismo Tedesco Contemporaneo* (Einaudi, 1956); and Carlo Antoni, *Lo Storicismo* (Radio Italiana, 1957).

历史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正好是理性主义者面对的困境的对立面，它也是因果关系普遍困境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他想维持因果关系的清晰界线，使原因和结果以一一对应的关系整齐地相对称，他必须将某些事件从历史‘无缝之网’中去掉，因为在这张网中每件事看来都和别的每件事有关。但是，在这样做时，他有意地损害了历史的真象，而这正是他要建立的东西。他的因果关系假设像理性主义者的演绎一样，只有在简化扭曲并因此而失去和历史经验中细节的实际变化的联系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完整。当探寻因果关系认识所产生的歪曲被用来作为创立一般社会理论的工具时，它们会导致求助于天意的“决定因素”或求助于经济的、政治的或宗教的“终极原因”。

假设历史主义者拒绝将复杂的历史真象当作单向因果关系祭坛上的牺牲品，像增加其经验假设的理性主义者一样，他可能开始坚持循环因果论的普遍性。如同在普遍的宇宙中一样，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互为原因后，他想找一种方式将这种观察体现于他对社会的看法之中。哎呀，他的热情只能是自戕。他考虑的原因越多，他就越不能区分原因和结果的具体联系，最后，真正因果关系观念只有在模棱两可中挣扎。

探索适应前述两难困境的尝试，导致历史主义几乎放弃因果关系思考本身。在寻找因果关系的代用品的狂热努力中，历史主义传统中的伟大历史学家们求助于作为模式的有机体的隐喻和艺术品的隐喻，在此基础上塑造对社会统一性和时代统一性的重构^①。他们主张或假定一种历史条件的不同要素，像有

^① 韦伯误将艺术形式仅仅当作一种阐释手段。见 Max Weber, *Objektive Möglichkeit und adäquate Verursachung in der historischen Kausalbetrachtung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ed.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Mohr, 1968), p. 278.

机体或艺术品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一样，相互联系着。这样一系列有机的或审美的相互依赖关系，挫败了简单“机械的”因果关系的责难。但它仍旧是因果关系吗，另外，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这样，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最后都把社会的研究者放到了相似的困境之中。在两种模式下，他都要么陷入看似精确但方向有误的方法，要么采用返归现实但只能逐渐归于空泛的观点。结果，必须在或多或少武断地孤立前提或程序和失去方法的明确性之间进行选择。

从另一方面看，理性主义立场和历史主义立场有第二个使人不安的共同特点。在其纯粹形式中，它们都描述必然性或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因此，除非扩张到混乱的地步，它们都引入了某种决定论并进而歪曲或未考虑社会生活和历史所经历的不确定性。

一旦我们掌握了由霍布斯的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选择所带来的问题，就容易理解经典社会理论所隐含的方法论大纲了。该纲要很少以简明和直接的方式表述过，但它澄清和归拢了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以及近代的社会科学实践中许多否则会不清楚和不连贯的东西。

避免落入理性主义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的陷阱的出路，在于形成一种方法，抛弃逻辑解释模式和因果关系解释模式所共有的东西，尽管它们有重要差别：即关心顺序和寻求必然性联系。非常需要重新定义说明某事是什么意思，或描述和解释某事意味着什么。

代替那些与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的因素联系在一起有序性模式，我们则需要一种描述和解释某种社会状况的不同方面在时间世界中的联系的方式。任务再一次是把我们关于事件

如何及为什么前后相继的认识与承认一种状况中的所有因素彼此相互联系调和起来。另外，人们需要以一种既简洁又准确的方式公正地评价这种相互联系。

同时，我们必须尝试以避免必然性含义的方式来描述要素间的关系。尽管，即使没有所有其他因素，某些要素也会出现，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这样一种解释模式，它会说明某一种特定社会状况中的所有要素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这样一种相互可能性或相互补充关系的性质还有待阐明，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方法问题直接与形而上学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问题相关。只要对某些事的每一个解释说明必须采用给定某些原因或前提、结果或推论所必须出现的论证形式，决定论问题就不难解决。

免除线性顺序的要求和避免决定论的重要性，都还没有穷尽对社会理论中一种满意的方法的要求。解释问题还有第三个方面，理性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因为忠于客观性而对此保持沉默。个人相互赋予对方行为的意义也就是给他们的行为鲜明的社会意义或人类意义，无视这种意义就是忽略经验的一个应当给予说明的方面。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识和理论家对行为的描述或解释之间的关系，促使我们全面反对完完全全同理性主义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的对立所直接产生的难题一样使人烦恼的谜。如果我们无视一个行为对其行为者的意义和对其行为者所属社会的其他成员的意义，我们就冒着看不到在我们想认识的行为中什么具有特别的社会性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严格固守行为者或其同代人的反思性认识，我们就会失去将真知区别于错觉的标准或贯穿在比较中的超出不同时代和社会的自我印象的标准。因此，必须以某种方式既考虑主观意义，又考虑客观意

义^⑫。

经典社会理论统一性的来源之一就是，在许多不同的招牌下进行的持续性努力，目的在于发现一种方法，而它会完成我上面所列举的那些任务。这样一种发现将会突然扩大我们综合社会的能力适用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以前的思想模式所不能满足的要求，人们可以赋予那些塑造一种程序以便把社会的或者历史的状况作为一个整体解释的尝试以重要意义。因此，属于解释范围内的某种环境的一切因素或方面应当以一种将会说明它们彼此之间相互的、非线性的联系的方式相互连结在一起。——对应的必然联系的陈述将被排除。最后，有关环境内若干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将给予描述，以便解释被研究的人如何认识他们的环境。然而，这种方法不应局限于参加者自己的反思性认识之中。

追求这样一种方法是一系列虽不同但相互重叠的概念的共同基础，它们一直控制着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理论和实践。在它们当中有“辩证法”、“理想模式”和“结构”。它们每一个都有独特的含义并与典型的知识传统相联。当然，鉴于我眼下的目的，它们共有的属性是首要的。马克思所发展的辩证法方法，韦伯所使用的理想模式和当代的“结构主义”都是自封的避开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不幸窘境的出口。

被辩证法、理想模式和结构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若不粗暴地破坏自发的和循环的相互联系，它们就不能

^⑫ 主观性和客观性困境在社会理论特定领域怎样出现的例证，见 Max Gluckman, *Concept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ribal Law in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Laura Nader (Chicago, Aldine, 1969), pp. 349—373；以及 Paul Bohannan, *Ethnography and Comparison in Legal Anthropology in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p. 401—418。

从 a 先于 b, b 先于 c 这样的线性发展系列中被挑选出来。

辩证法的、理想模式的或结构整体中的各个部分构成一种统一，但不是每一因素使所有其他因素成为必要或所有其他因素使每一因素成为必要的那种统一。那么，它们凭借什么结合在一起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我正提请注意的方法科目的第三个特征。整体内各部分的统一是一种意义的统一：各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更一般的关于个人、社会或自然的原则或概念。但到底什么是语义统一呢？

有时，人们把统一性的概念赋予被观察的人。因此，例如，韦伯放置在他的理想模式的新教伦理中的倾向和信念使得信奉这种伦理的人们所具有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观点具体化了^③。有时，构成各个部分统一的概念是理论家所主张的，而不是其信仰和行为正在被研究的人们所承认的。例如，根据某一种版本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以一种其真实的性质可能不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包括资本家阶级本身所知晓的方式，相互联系着^④。这些语义统一标准的缺陷在于它们或者使得构筑一种全面的社会理论成为不可能，或者它们牺牲了认识的社会意义及它与行为主观性的联系。

因此，第三种理论试图把对于意义问题的主观方法和客观方法统一起来，并且纠正它们各自的缺陷。统一的概念被归属于被观察者“无意识的”的普遍倾向和模式之中。因此，就像在

^③ 但有关条件，见 Alexander von Schelting, *Max Webers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34) . pp. 329—335 ; and Dieter Henrich, *Die Einheit der Wissenschaftslehre Max Webers* (Tübingen, Mohr, 1952) . pp. 83—103。

^④ See Karl Marx, *Das Kapital* . ed. H. — J. Lieber and B. Kautsky (Stuttgart, Cotta, 1962), Vol. I, pp. 47—48.

辩证方法中那样，人们需要一个基础以便得出跨越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判断和比较。然而，通过假定连接整体之中各个部分的原则内在于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的人们的头脑中，我们对于意义是主观的这个观念也可以同意，但是，那只是在切断主观性观念和意识之间的联系条件下才同意的。这是依赖于头脑中的无意识“结构”这一观念的各式各样的当代社会科学所采纳的路径。（例如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 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以及格式塔心理学。^⑮）

辩证方法、理想模式方法和结构方法之间的区别在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方式上变得非常重要。根据这种方式，人们界定关于人的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相互认识之间的关系，界定理论解释和反思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将这些方法当作对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冲突的一系列相似的反应加以考虑时，这些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便失去其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考虑，所有的方法都因相似的难以弥补的缺陷而备受折磨。

这些缺陷对于社会研究中的某些重大的未解决的方法问题负有责任。一个难点与因果关系解释和辩证法的、理想模式的或结构的解释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关，一个更为根本的障碍则是，致力于确定逻辑解释和因果关系的替代物的努力具有致命的不准确。

每一种形式的社会思想都必须尽量满足如下的需要，即描述和解释历史上前后相继的某些事件是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

^⑮ See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1972), pp. 62—63; Claude Levi-Strauss,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Plon, 1958), pp. 308—310; and Kurt Koffka,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Harcourt, 1935), p. 175.